

传习录全集



天人合一存天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

明·王守仁◎著
王先华◎译注

杨郁◎审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传习录全集



人合一存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明·王守仁◎著
王先华◎译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习录全集 / (明)王守仁著;王先华译注.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1-08828-0

I. ①传…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心学 - 中国 - 明代 ②《传习录》 - 译文 ③《传习录》 - 注释
IV. ①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3799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开本 29印张

字数: 504千字

定价: 39.80 元

前言

现执教于贵州师范学院在先华君，是我昔年的同窗、多年的好友，曾任贵阳市教科所所长等职，对教育一片痴情。岁余之前，专程来京，携来一稿，洋洋洒洒五十万言，取名曰《传习录全集》，说是两年前编写高中地方教材《贵州自然与人文·阳明心学》时，学习阳明先生心学的一点心得。嘱咐我务必“审读”且为之“点睛”。一者我对阳明心学的甚爱，一者我对先华盛情的难却，勉为答应。读学全稿，又一次窥见先华如椽大笔的潇洒和旁征博引的深思，于是乎情不自禁，以效犬马之劳。如今“审读”完毕，难说是“点睛”，至多为“续貂”而已。现在诚恐惶恐，将我所认识的王阳明信笔写来，以就教于各位阳明学大师和广大读者，以期起抛砖引玉之效。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8年（1472年10月31日），逝世于明世宗嘉靖7年（1529年1月9日）。王阳明曾经在会稽山阳明洞筑室，因此自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三立是中国人理解人生的三个高标准，或者说是成功人生三部曲，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即“做人”、“做事”、“做学问”。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王阳明平定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击溃宁王朱宸濠篡位叛乱；王阳明融合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以“心即理”为基本观点、以“致良知”为基础功夫、以“知行合一”为目标的“阳明心学”。王阳明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很多人是博而不精，而王阳明是既博又精，博大精深，是实实在在的大师！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跟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他的粉丝如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李贽、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蒋中正等，无不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我对王阳明的认识，是从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流传的一首儿歌开始的。

那是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不知在什么地方、从谁的嘴里听说了这样一首儿歌：瑞云楼，龙泉山，余姚出了个王伯安。当时对此含义几乎一无所知，只无端地依稀记得：“瑞云楼”在“龙泉山”，楼中有个人叫“王伯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渐长，大致知道“王伯安”即王守仁、王阳明等。

1977年12月，幸逢一个划时代人生大变化，我凭着偏僻农村带帽初中的经历参加停止了十年之久而恢复的高考，居然“榜上有名”，从此“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在大学里，得知王阳明是“唯心主义”。哲学老师不无调侃地讲王阳明的笑话，当时怎么讲的，使用了那些词语，至今几乎忘记了，但故事至今还记得，这就是《传习录全集·211条》所记载的：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思是：先生到南镇游览，一位朋友指着山岩中开花的树问王阳明：您说过：“天下无心外之物。”就像这开花的树木，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相关呢？先生说：你没有看这些花的时候，这些花和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这些花的时候，则这些花的颜色顿时就明白起来。由此就明白这些花并不在你的心外。

我当时虽然已经二十来岁，可是因为眼界不宽，学识不多，因此思路很窄，思考很浅，只是自己蠢蠢地想，这王阳明也真是的，读了这么多书，还教这么多学生，怎么会说出“天下无心外之物”这种不靠谱的话来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这不是“谬种流传”吗？我当时完全不可能相信王阳明“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的说法，因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从内心感觉到“唯物主义”真好，“唯心主义”真傻！可我一直弄不清楚像王阳明这样的“圣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为什么要下这样的结论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大脑之中挥之不去。一直到了我完成《老子新学》之后，一直延续到了在我细细地阅读《传习录》及王阳明的有关书籍之后，我才觉得王阳明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啊！王阳明从十七、八岁开始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到三十七在贵州龙场“悟道”，花了整整二十年；我从二十岁开始“生疑”到五十五岁自觉“释疑”，整整经过了三十五年，而又过了三年才认真拜读《传习录全集》，足足三十八年啊——

真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啊”！

要理解王阳明，不仅仅要走近王阳明，更要走近自己：王阳明出生书香门第，爷爷王天叙、父亲王华都是大学者，父亲点过“状元”，因此王阳明的家学渊源至为深厚。据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说：其母“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王阳明祖父王天叙竹轩公“异”之，于是给王阳明取名“云”，即“王云”，“龙从云，虎从风”，象征王阳明是“龙”——望子成龙，人之常情，爷爷也不例外！王阳明出生地小地名叫“龙泉山”，“乡人传其梦”，把王阳明出生的那栋楼被称为“瑞云楼”，余姚人，这些跟我儿时记得的那首儿歌居然如出一辙。

可王家的这条龙“五岁不言”——五岁还不会说话，说话实在是太迟了——据说乾隆皇帝说话也很迟，说话迟“主贵”。一天，王阳明正在跟一群孩子嬉戏，“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阳明的爷爷突然省悟，给王阳明更名“王守仁”（《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守仁”盖源自此），“即能言”——难免有夸张的说法！不久之后的一天，王阳明自个人诵读爷爷竹轩公曾经读过的书，爷爷竹轩公感到惊讶而问其根源，王阳明说：“闻祖读时已默记矣。”王阳明十岁那年，其父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晚称海日翁，尝读书龙泉山中，又称龙山公）点了“状元”。次年其父王华迎养其爷爷竹轩公，王阳明跟随前往。经过金山寺，爷爷与客酒酣，准备赋诗，还没写完，十一岁的王阳明在旁边就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人大为惊异，以为可能预先准备，“命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回答说：“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第二年，王阳明十二岁“就塾师”，“豪迈不羁”，其父“常怀忧”，只有爷爷竹轩公“知之”。一天，王阳明跟同学在长安街上走着，突然遇到一个看相的。看相的很诧异地说：“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王阳明对此深信不疑，“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王阳明曾经问塾师说：“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回答：“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其父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

王阳明的故事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比如结婚当晚访道不归，庭中格竹积

劳成疾，龙场悟道醍醐灌顶，致良知而知行合一等等。通过这些，我得出了对王阳明的下面几点认识：第一，王阳明的理想很崇高，不愿把“惟读书登第耳”作为“第一等事”，而把“读书学圣贤”作为“第一等事”。第二，王阳明真诚清明，赤子童心。第三，王阳明聪明好学，正本清源。第四，王阳明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第五，王阳明深思熟虑，身体力行。王阳明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诚诚实实、坦坦荡荡，正如在军旅之中的弥留之际，弟子问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正因为“此心光明”，为了“读书学圣贤”，王阳明曾经苦苦钻研程朱理学，对“格物”、“致知”等功夫依次身体力行。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发生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显示出“此心光明”。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这样说：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传习录》这样说：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熹《四书集注》对“格物”进行的注释），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不与诸公知道（《传习录全集·297条》）。

《传习录》这段话的意思是：先生说：众人只是说“格物”要按照朱熹的方法去“格”，又有谁何曾按照他说的去做了呢？我却是实地做过的。早年跟一位姓钱的朋友共同讨论做圣贤需要“格”天下之物，眼下哪里有这么大的精力呢？所以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一下看。姓钱的朋友就从早到晚去格竹子的道理，竭尽心力地持续了三日，就导致积劳成疾。当时我说他这是因为精力不足，因此我亲自上阵去“格”，从早到晚也没有获得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也导致积劳成疾。于是跟姓钱的朋友相互感叹说圣贤这事儿不是我们做得来的，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等到在贵州龙场的蛮荒之地呆了三年，对于“格物”颇有心得，才知道天下之物本来就没有可以去“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己的身心上去下。坚定了“圣人是人人可做”的信心，自己也就有了志在为圣人的担当了。这里

的原委经过，要说给诸位知道。

格竹子的故事基本上说出了“阳明心学”从研究到出成果的过程：王阳明希望“读书学圣贤”，于是按照朱熹“格物”的观点准备去“格尽”天下之物而成就“圣人之功”。于是“鼓动”钱同学去格竹子，钱同学只“格”了三天就积劳成疾，败下阵来；王阳明认为钱同学精力不足，亲自出马，虽然坚持了格了七天竹子，也没格出什么名堂，最终还是积劳成疾，败下阵来！王阳明就这样一直想，一直想，“格物”到底怎么“格”，“格”什么呢？二十年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最后的结论是“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心即物”、“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天下万物无法尽“格”，所以能够“格”的惟有自己的“心”上之“物”而已，“万物同源”、“万物一理”，因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一回事，不能当成两件事情看。

“心即物”、“心即理”是王阳明所有思考的理论性的总结，是从严密的推理演绎出来的。王阳明的功夫是从纠正朱熹“格物”的解释开始的。王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过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传习录全集》之296条）。 ”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格物”就是“格”心中之“物”，正万物的不正，以便万物归于正，因此去明白“物”中之“理”。“物”中之“理”是天理，是良知；“物”中之“理”是“致知”，是“致良知”；致良知就能够“知行合一”。

依据“心即理”的基本观点：王阳明从《大学》的“格物”、“致知”得出一个“知”——一是“知识”的“知”，即所谓“见闻”，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获得；一是“天理”的“知”，即所谓“良知”，是一个人的天赋；王阳明从《大学》的“诚意”、“正心”得出一个“行”，于是综合《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左右逢源，拈出来“致良知”三个字，因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全集》之006条），王阳明把“知”跟“行”巧妙地链接在一起，“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主意，“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开始，“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成功。

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给“阳明心学”理出了一个粗粗的线条，可是“心即理”为什么“不无道理”，还没有涉及呢。

“心即理”的意思是：心是宇宙之中一切事物的本体，这个“心”相当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心”具有客观性。可心是宇宙之间“灵明”，而“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全集·311条》）”，这个“心”相当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个“心”具有主观性。这是王阳明汇通百家的一个巧妙思路，把“心”与“物”，“心”与“理”有机地融会在一起，真是“巧夺天工”啊！

王阳明是这样阐述“心”与“物”、“心”与“理”之间的关系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全集·311条》）。”

这段话的意思：天离开了我的“灵明”，谁去仰视天的高远呢？地离开了我的“灵明”，谁去俯视地的深邃呢？鬼神离开了我的“灵明”，谁去辨别鬼神的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开我的“灵明”，就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开天地鬼神万物，也就没有了我的“灵明”。

这段话中的“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和“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准确无误地说出“心即物”、“心即理”的核心主旨，阐述了“心”、“物”、“理”之间“有物混成”、混而为一的关系。没有天地万物等就没有“心”，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人”也是天地万物之一分子而已；可没有“心”就没有天地万物等，似乎很难理解，因为没有“人”，按照现在科学研究的一般观点，“人”没有出现之前，天地万物等不是早就在那里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吗？这就回到了我那“三十八年”的疑问。

王阳明的“心即理”，说的是“主观”跟“客观”的问题，是“心”跟“物”的问题，是“精神”或“意识”跟“物质”的问题。“主观”跟“客观”、“心”跟“物”、“精神”或“意识”跟“物质”，从认识的角度说，是以对方存在作为己方存在的前提的，两者的关系是同一性的问题，只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之中，而不能有先后，也不能分轻重，没有第一、第二的区别。在“人”没有出现之前天地万物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的，对此王阳明心里清楚得很。可这种“天地万物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是“人”所赋

予的，是“心”所认定的，没有“人”的赋予，没有“心”的认定，从认识上看，这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因此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全集·009条》）。”

现在回到《传习录全集·211条》所记载的故事再看看：王阳明认为，花树是一种存在，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与我心没有任何关系，是作为毫无“意义”的自然而存在的，因而王阳明对朋友说“与汝心同归于寂”。而当朋友看花树的时候，这就是朋友的体验，此时此地的花树就跟朋友的生命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朋友生命存在的对象，此时此地的花树便在朋友心之中。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的心是“小心”，而所有人的心是“大心”。“小心”是个人的“心”，是个体的认识；“大心”是整体之“心”，是群体的认识。“天下无心外之物”本来是从“大心”而言的，可“朋友”从“小心”上去理解并提问。既然“万物一体”、“万事一理”，因此“大心”、“小心”，都是一个“心”，王阳明回答问题向来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不无不可，也可算“言之成理”、“言之有据”。

1973年以来开始流行的“人择原理”即“人择宇宙学原理”跟王阳明观点一脉相承。“人择原理”最简明的说法是：正是因为人类的存在，才能解释人类所存在的宇宙的种种特性，包括最基本自然常数等等。如果宇宙不是人类所存在的宇宙，就不可能出现人类来谈论宇宙的情况。

“阳明心学”作为一门“炼心的学问”，实实在在地在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心即物”、“心即理”——没有心，宇宙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价值；没有心，人世间的一切理论都一钱不值！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一颗具有“良知”的心，这种“心”就必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因此一个人要时时倾听自己的良心，有“此心光明”的自信；因此一个人要处处发挥自己的良能，有“知行合一”的自重。

“走近王阳明，更要走近自己”，这是我们学习《传习录》的一点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身体力行，没有自己的亲力亲为，很多东西理解不深，运用不透，甚至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阳明心学”有自身的特点，有自己的体系，必须理清楚了其间的各种关系，才能逐步做到运用自如。“阳明心学”是为了拯救沦丧的道德而出现的学问，“阳明心学”是渴望成为圣贤而形成的学问，所以王阳明能够至死坦坦荡荡，笃信“此心光明，亦复何

言”，而对那些蝇营狗苟、口是心非之徒，王阳明则斩钉截铁、义愤填膺地说：“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

中华文化之灿烂，如日如月；其著述之丰富，如烟如海。粗计文集，当不下千余万卷。在王阳明看来，历代的史书与先儒的经典，只有体例上的区别，而发掘书中内涵，不难发现先圣、先哲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明善恶、示训戒”。

这些内容可以简单总结为六条：

第一，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王阳明认为，“无事时存善”、“有事时省察”，是“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的两种基本方法。“无事时存善”的目的是：加强内心修养，进而体认“天理”和“良知”；“有事时省察”的目的是：在为人处世之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去行事，去修道。因此王阳明主张通过“静坐思虑”的方法，在无事时将各种“私欲”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的境界，乃至本体明净度。“无事时存善”是“反身以诚”，是“防于未萌之先”；“有事时省察”是“实地用功”，通过对“声、色、货、利”等日常事务经验，去体认“良知”。

第二，明善是诚身的工夫。《大学》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绎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重要环节，因此王阳明主张“格物”（正心诚意）的基础上，发现人心固有的良知，为“为善去恶”的目的服务。

第三，穷理是尽性的工夫。朱熹认为，人心包含万物之理，但人心不能直接认识心中之理，而必须借助于格物，通过认识具体事物才能“穷理”。因此，朱熹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王阳明不同意朱熹“即物穷理”的观点，认为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把“心”与“理”分开，降低了“心”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当世理学家言行不一，空谈义理，出现“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的现象。因此，王阳明希望学者懂得“心即理”的含义，尽在“心上做功夫”，“去私欲”而“正其心”，居世处事都合乎“天理”。这是一剂醒世凉药，值得每个人深思熟虑，这也是王阳明不断强调“知行合一”的原因所在。“道德天地，知行合一”是人类必须永远遵循的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第四，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王阳明出生的时候，程朱理学处于全盛时期。开始的时候，王阳明虔诚信奉程朱理学，通过研读体悟，对此产生了

很多疑问，经过一段长时间思考，他终于开悟，自立学说，倡导心学。王阳明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独具见地，这就是“道问学”而“尊德性”。

第五，博文是约礼的工夫。王阳明认为，明代中叶的世风日下、政治危机的根源是圣学不明，是人们不能信守礼约。王阳明一生以弘扬圣学为己任，怀着“辅君淑民”的抱负，讲学不辍，所到之处，制定“乡约”，或兴“社学”，或创“书院”。同时，他还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教条”，作为学者的思想准则。

第六，惟精是惟一的工夫。王阳明说：“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意思是：只有精通圣哲的经典，上述先贤的天理，并以此去教化人民，才能使人心一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

我们不说李贽因“阳明心学”创立“童心说”，也不说王夫之因“阳明心学”而光大“气化论”，只说一个日本和尚引进了“阳明心学”，一时间在岛上出现轰动效应。这次轰动效应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并且出了一位“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东乡平八郎（1848年—1934年）。东乡平八郎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被任命为海军部长，1905年回到日本参加庆功宴会。在宴会东乡平八郎沉默不语，就在大家心有疑虑的时候，只见他拿出了自己的腰牌，上面是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日本人做人做事都是很认真的，没有作秀的可能，至于东乡平八郎何以如此崇拜王阳明，这里无暇细论。倭寇扰我海江，戮我人民，罄竹难书，可日本人学我“阳明心学”，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模仿！王阳明在这个世界上才活了58岁，可他作为一代宗师，不仅在当时为人敬重，也在当今被人信仰。

我想，在国内，在国外，在当下，在未来，是否还可能出现东乡平八郎这样的顶级粉丝？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曾经这样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对这样的粉丝，对这样的预言，我姑且翘首以盼。

杨 郁

2014年3月于北京

凡 例

1.《传习录全集》著作目的：《传习录全集》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习录》进行“简注”、“译文”、“评点”，让读者能够从文字训诂上理解“阳明心学”，从哲学体系上沟通“阳明心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明白“阳明心学”。这是一项至为艰巨的任务，也是《传习录全集》致力于承担的历史责任。

2.《传习录》的基本情况：王阳明留下的著作有《传习录》、《阳明全书》、《大学问》三种。《阳明全书》即《王文成公全书》，共有三十八卷，是王阳明的门人所辑。《大学问》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已经作为《传习录全集》的附录，读者在阅读《传习录全集》原文之前，最好反复阅读，以便初步理解王阳明的基本观点。《传习录》书名的“传习”两字出自《论语》“传不习乎”，是王阳明跟弟子、朋友等论学的实录或论学的书信汇编，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名师与高徒“论学”教案，学术背景之深，涉及知识之广，推演答案之严，回答疑问之简，都独树一帜。因此，初学《传习录》，无不如坠缤纷五彩之中，目不暇接，四顾茫然。因此，希望很好地阅读《传习录》，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理所当然。有关《传习录》版本基本情况如下：从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陆续记录了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的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王阳明论学谈话一起刻板印刷，书名仍然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粉丝、时任绍兴府知府的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刻板印刷。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钱德洪自己跟王畿所录的内容编成《传习续录》刻板印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刻板印刷《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且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此即《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

习录》，《传习录全集》即以此作为底本。

3.《传习录全集》的基本结构：《传习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形式是“问答”，有时候是一问一答，有时候多问多答，本书把大致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都作为一条。这种形式出现实录之中，也出现在书信之中。第二种形式是“语录”。这种语录有长有短，但凡相对独立的，都作为一条。第三种形式是“长篇大论”。这种长篇大论为数不多，只要出现在书信中，虽然内容很多，可很不容易梳理出一个个问题，所以，不得已也作为一条。按照这种基本思路，全书被分为319条。《传习录全集》给每一条都取了一个标题，以概括这一条的基本思想作为目的，大都取自本条中的名言警句或关键词语。这可以给读者一点提纲挈领的启示。每一条除了标题之外，一般分为“原文”、“简注”、“译文”、“评点”。“原文”即《传习录》的原文，按照《传习录全集》所分出的条数加以排列。

“简注”的重点是“理清概念”、“介绍背景”、“说明缘由”，因此对常用的概念如“格物”、“良知”等，在不同的条内都加以“简注”，目的在于强化“阳明心学”的逻辑性，思辨性。“译文”是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且不损害“原文”的文意和文气，所以对概念如“格物”、“良知”、“致良知”、“无善无恶”、“生之安行”、“生而知之”等等不过“直录而已”。“评点”是本书的难点也是亮点，我们作为单独的一个方面加以介绍。

4.《传习录全集》“评点”的基本视点。我阅读了现在坊间各种版本的《传习录》，不仅仅在“译文”上普遍存在燕书郢说的情况，“评点”上更是几乎处处“牛头不对马嘴”，张冠李戴，丧失一个作者最基本的良心——我曾经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写书更是最重要的学习。《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因此“教学相长”啊！“教”跟“学”能够相互促进，“读书”跟“写书”自然是最有效的相互促进。可现在而今眼目下，“传稿公司”层出不穷，“神童”、“大师”风起云涌，无知无畏者纷纷赤膊上阵，于是“小学生写给中学生看”、“中学生写给大学生看”、“游医写给病人看”，乃至“不生病”的“大智慧”、“永不败”的“大谋略”、“套牢土豪”的“国学”，“未卜先知”

的“易学”，东拼西凑，前言不搭后语，真是乌烟瘴气，令人发指，导致图书市场的快速萎缩，引起读者的强烈抵制！这不等于自掘坟墓？这不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种背景下，投射到《传习录》的点评上，更是云诡波谲，信口雌黄，不知其所来，不知其所往。因此我说“评点”是本书的难点也是亮点。因为“难”，“转稿公司”的“转稿匠”，字未必认得完，就想提笔撰文，面对天书，不得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知所云。《传习录》的“评点”所以“难”，是因为阳明心学跟玄学差不多，具有自己的一套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和推理模式，不明白这些，不要说“评点”，连文字层面的意思都搞不清楚，自然蚊子吃菩萨——无从下口！正因为很多书没有说清楚，很多人没有弄明白，所以我们对此设想了一些要点，以便给读者一些我们的体会。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基本方法，“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因此，阅读《传习录》先要明白这几点：

第一关于“心”、“理”、“事”、“性”、“道”、“天”等概念，即阳明心学的“本体论”。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在心之外没有“理”，在心之外没“事”。“理”即“天理”、“良知”，“事”即事物、事件等。“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不过是“心即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心即性，性即理”：“心”就是“性”，“性”就是“理”。“心”为“良心”，“理”为“天理”，“性”是什么呢？“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王阳明认为“命”就是“性”，“性”就是天赋予人的禀性。在阳明心学中，“性”似乎具有统率的含义，王阳明这样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这段话以“性”作为一个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自“形体”而言谓之“天”，自“主宰”而言谓之“帝”，自“流行”而言谓之“命”，自“赋于人”谓之“性”，自“主于身”而言谓之“心”；自“心之发”，“遇父”就谓之“孝”，“遇君”就谓之“忠”。王阳明因此断言：“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王阳明还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王阳明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给这种圣物取各种名字，这种名字很像《老子》

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所以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在本体论上，王阳明最充分的认识在下面四句话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被誉为“王门四句教”，有这样的版本：“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把“心”作为“体”而言的。按照王阳明的观点，心即物，心即理，因此“心生万物”，“心生万理”，万物同源，万物一理，所以“心”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一样，不生不灭，自本自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在“无”的环境中看问题，“无善无恶”是“至善至美”的，不是跟“有善有恶”相对应的。读不懂《传习录》的关键之处，就是没有弄清楚“无善无恶”是“至善至美”这句话的基本含义。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把“心”作为“用”而言的，是在“有为”的范围在讨论问题。因为“道”衰而“德”兴，所以必须讲究“仁义礼智信”，这就是“意”。王阳明认为，“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只要“循理”而行就能够“止于至善”。可是由于“气拘物蔽”等原因，并非每一个“意”的产生都可以依据心体“循理”而动，一旦在出现“过”或者“不及”的“意”，这个“意”就是恶的，这就是“有恶”。这就是王阳明为什么说“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的逻辑关系。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把第二句的“有善”等同于“无善无恶”而得出来的，说明“心体”得以实现的情形，因而保持了“无善无恶”的心体。从王阳明的逻辑来看，这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可这其实违背了“心即理”、心是本体的基本规则。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理之静”相当于“心之体”，“气之动”相当于“意之动”，因此“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相当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什么是“理”？什么是“气”？王阳明说：“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

“无善无恶是”只有“至善至美”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是非的状态；“有善有恶”具有多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具有各种不同的是是非非。

“知善知恶是良知”处在所谓“未发”的“知”环节，而“为善去恶是格物”处在所谓“已发”的“行”的环节。“良知”能够从恶意开始萌芽就加以防范，而“格物”则是恶意已经发展才加以克制。

王阳明有关“本体论”的观点，几乎取自“道学”，也跟“道学”的很多大师一样，没有将“本体”固定在一个字眼上，所以常常出现含混的地方。

第二关于知、行等的“知行合一”实践论。

阳明心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基本的途径就是实践，就是“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合一”跟“理”、“心”等所谓本体是一回事，所以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因为“知”是“理”的“灵处”，所以“知”“就其主宰处说”就是“心”，“就其禀赋处说”就是“性”。实践必须具备一系列的主意或工夫，如“格物”、“诚意”、“明善”、“诚身”、“穷理”、“尽性”、“道问学”、“尊德性”、“博文”、“约礼”、“惟精”、“惟一”等，有的时候是“工夫”，有的时候是“主意”，因此王阳明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知行合一”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是做圣人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阳明认为，不能“知行合一”就会伤天害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

第三关于“率性”、“修道”等的认识论。

王阳明认为，“知”即明“知识”和明“天理”。“知识”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得到的，被称为“知识心”，“天理”是与生俱来的，被称为“道德心”。一个人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天理”。据此王阳明这样说：

“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天理”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还是有差别的，分为“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三类。“生知安行的是圣人之事，自然能够尽心、知性、知天，即所谓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学知利行”的是贤人之事，应该“存心、养性、事天”，即所谓